

留美幼童“美国化”与计划中止

——试析留美幼童计划夭折之因

刘 翎

内容提要 清政府留美幼童计划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官费派遣出国留学,笔者以留美幼童为主体分析其中途夭折的原因,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时,留美幼童年龄幼稚,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根基,面对美国社会环境和文化,毫无以中国传统文化抵御或“融合”之力,迅速滑入“美国化”的道路,导致清政府——不仅是顽固派保守势力,而且革新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中止了留美幼童计划。

关键词 留美幼童 官派留学 容闳 计划中止

刘 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1872—1881年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官费派遣出国留学。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30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其后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120名幼童(年龄在10—16岁间)到美国留学。近代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幼童留美计划大体有四项内容,除了上述的选派120名幼童,分四批,每批30名以外,还有将留学期限定为15年,另加2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20年时间,预算120万两白银。其目的如李鸿章所言:“以求洋人擅长之计,而为中国自强之图。”^[1]至1881年8月下旬,幼童留美时不到十年,便被强迫停止学业,分三批遣返回国。此计划以中途夭折而告终。

就清政府官员的思想动机、启动规模和官方财政投入而言,这是一项史无前例之举。但是资

料的发掘和研究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增多。至本世纪初,“留美幼童计划”专题论著才应时而生。关于计划中止的主因,国内学界论及时几无争议地归于一点,即,“是被清王朝顽固守旧派和一切惧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人所葬送”^[2]。国内第一本研究留美幼童的专著《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本文无意否认庞大的中华帝国保守落后的世界观是中国近代进步和改良的思想障碍,也是扼杀先行者的无形利器。但在全面考察留美幼童计划始末时,我认为应从留美幼童这个事件的主体出发,真正越过东西方的睽隔,直面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当是留美幼童。在代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诸多力量支配之下,留美幼童非常单薄无力,当我们就其文化素质、世界观的认知能力加以分析时,对上述观点存有质疑。留美幼童因年龄幼稚,先天文化营养不足,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才是留美幼

童计划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选派幼童留美的动因不同,埋下了计划失败的伏笔

提出幼童留美计划的是容闳,而实施了这个计划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如果加上留美幼童,有三股力量在这项计划里起作用。三方的动机,在根本上不同,实为南辕北辙,为计划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面临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大变局”。1861—1862年间,英法俄美等国先后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清政府成立了专门负责通商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方的对外交涉已经成为日常事务,而外交翻译人才的缺乏已使清政府大感窘迫。中外大臣会商,不得不聘用洋人做“通事”,李鸿章、奕訢为此感到无奈。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与洋人打交道也使用过中国人作“通事”。主要是广州和澳门一带与传教士接触而自发产生的“通事”群。但这些人素质不高,甚至品行不端,与洋人关系密切,不受清政府信任,李鸿章、奕訢等人甚为不满。所以李鸿章和奕訢要迫切培养的不只是语言翻译,而是清政府的外交人才。

清政府不仅急需自己培养的外交人才,还需要造船制器的技术人才。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决意筹办海防江防,造船制器。洋务派认识到设厂自制船炮是长远之计,但“工费需时”。他们要在短期内见效,选取一条捷径,就是购买洋人船械,买了洋人的机器,只有聘用洋人工程师指导,这又为洋务派增添了心病,一是洋教习常有不传之秘,二是洋务开办以来,他们发现西学与中学有着极大的不同:“盖中国之办法与外国异,外国事务实而我则蹈虚也,外国事事皆真而我则粉饰也。”^[3]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的同时,奕訢等人奏请设立了旨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京师同文馆,李鸿章在上海和广州相继设立“广方言馆”,分英法俄三馆教习。为了能应对外交场合,掌握西方技术的精奥,奕訢还提出派员出洋考察,随着清政府官员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洋务派对“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洋务派在开始的练兵、制器、造船三大要务之后,很快意识到“用人一条,最关紧要”。没有自己的人才,并不能达到“自足于己,无求于人”的目的。要窥得西人奥妙,当“远适肄业”,“冀成有用之材”。经过几番办洋务的挫折,洋务派终于意识到培养自己的人才

是第一要务,遂采纳容闳的建议,以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以造就自己的西学人才为门径。可见,洋务派选派幼童留美的动因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维护清政府统治,挽救清政府衰亡之命运。

容闳极力鼓动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的动机却并非如此。容闳是在西学的影响下,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旨归。洋务派是从落后的中国现实里向外看,急于取西洋技术为已所用,容闳则是带着对西学和美国的模式回国,试图使中国从幼童开始,以西方思想改造中国。

容闳的独特经历决定了他的动机。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省南屏镇,南屏镇距澳门仅四英里。容闳7岁时进入英国传教士郭士腊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门兴办的教会女子学塾读书,13岁时容闳进入教会在香港举办的玛礼逊学校。19岁时跟随校长布朗到美国,在哈特福德孟松学校预科两年,1850年22岁时入耶鲁大学。1854年26岁时毕业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而成为中国人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第一人。1855年初,容闳回到国内。

容闳直到19岁出国,没有接受过中国旧塾的传统八股的教育,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他做了幼学启蒙。西学对于容闳是自小就自然而然的事,可谓根深蒂固。《西学东渐记》第一章至第三章中,多处可见其对西人品德的赞美。容闳对教育之于人的改造深信不移,既能改造和教化人,自然可以达及社会。“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容闳认为改造中国首先需要教育,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教育。“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5]“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6]这种教育的功效,已经被他理想地提升到以西方文明来改良东方文化的层面,完全不合清政府的动机。1854年回国后,他将兴办教育作为第一要务,在中国社会里蹉跎辗转,1863年才得以见到要人曾国藩。直至1870年春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奉旨会办“教案”,容闳作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得以有机会向曾国藩重提留学教育事,曾国藩等以选聪颖幼童“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图自强”为理由,将派遣幼童留学计划上奏朝廷。1870年冬,朝廷的朱批下来,容闳开始与清政府商定留学计划的各项细则。

考察容闳力倡派遣幼童留美的理想之来由,可见其与清政府的不同之处。曾国藩等人急功近利,容闳则为长远打算。旅美学者高宗鲁指出:“在曾国藩只求立竿见影急功近利,加紧训练科技人员外,实看不出清廷尚有其他远图。而容闳志不在此,他力求幼童接受彻底西方教育,故容闳着重长远打算。”^[7]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沈潜、杨增麒译注《西学东渐记》在序中指出,容闳在美国的八年生活,使他比较系统地受到了西方教育的长期熏陶,同时亲眼目睹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科技的成就,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铸就了他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观念,而产生了维新中国、变革中国的远大理想和抱负^[8]。

至于留美幼童,他们赴美留学的动机是缺失的,含糊不清的。考察留美幼童的出洋留学动机,前提是他们应当有自主行为能力,幼童年龄就成了首要因素。

从时间顺序来看,最先提出具体方案的是容闳,从筹款、建预备学校、确定人数和年限主要几项稍有头绪后,就议及招考章程。时间按容闳《西学东渐记》里所记,当在1870年末至1871年初,正是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完毕回到南京,将留美幼童计划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容闳酝酿16年的计划,对具体条件早有所考虑。他将选派学生年龄定为12岁以上,15岁以下,当应是出自他个人的求学经历及从根本上改变幼童气质的愿望。

李鸿章则根据驻华外国使节的建议,以为应选派20岁内外的,“须选20岁内外通习中国文义者,到洋后专习洋学,乃易会通,十年可成;若华洋书兼肄,恐致两误”^[9]。李鸿章指出,即便如容闳等拟派汉文教习随15岁左右之幼童同去,亦“多费而少益”。15岁左右算是幼童的话,以20岁内外的年龄应该是由少年而到青年了。最主要的是他们已“通习中国文义”。“通习”不“通习”,对幼童在西式教育中留住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至于朝西化的路上不可遏制地滑去是很要紧的。曾国藩考虑了李鸿章的建议,在奏折中开列了《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六条,将幼童年龄定为“俱以年12岁至20岁为率”^[10]。对年龄又提出异议并修改的是奕訢,他认为“若以20岁计算,则肄业15年回至中国将及三十六七岁,其家中父母难保必无事故。且年近20,再行出洋肄业,未免时过后学,难忘有成。应请酌定,自12岁至16岁为率,并剔除亲老丁单之学生”^[11]。第一个理由是维护社会伦理,传统社会“父母在,不远游”,

既然“游”了,要从伦理上给一个缓冲,12岁时离家,15年后回来,父母尚可健在,20岁外出归来已是三十六七,父母有“事故”的可能性就大。第二个理由,有学习效果的考虑,“时过后学,难忘有成”,但是这只是奕訢基于传统社会现实的主观推测,不是基于对西式教育了解的结论。依照奕訢的主张,选招幼童的年龄定在了12至16岁之间。

事实上,赴美幼童的年龄是由招生时的时势决定的。1871夏,第一批30个名额在上海就没有招足,容闳只得亲赴香港,到英国政府所办学校里去挑选学生以补足数额。招生数额不足,传媒不发达是首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西学并不为社会主流接受,清朝贵胄仍视科举为正途。投考者中清朝贵胄子弟无一人,已可见主流社会对此事的冷漠反映。而第一批30人中,广东籍人就占24名,全部四批120名幼童中,广东籍共有84人,地域特征很明显,这固然因为广东的沿海开放,老百姓接触洋人多不怕洋人,还有一个原因是招生的官员是乡民们熟悉乡音的容闳,已经是从小出洋留学现在做了官的榜样。由于这样的社会基础,清政府拟定的年龄条件只能在招不足定额的现实情况下,照实收下愿去的幼童。按照规定年龄作了将就,第一批幼童里10至11岁的就有6人,而16岁的只有1人,14岁有10人。120名幼童里,到达美国的平均年龄12.5岁。

在这样的年龄背景下,幼童出洋的动机实际呈现了缺失状态。客观上在19世纪的中国,要说12岁左右的幼童有自主离家的动机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幼童之所以出洋留学,其一这是政府行为,“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其二,要由家长同意,是家长自愿送孩子出洋。“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12]。詹天佑父亲詹兴洪照章具结的全文是: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尚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12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13]

“曾经读中国书数年”是清政府挑选幼童的条件之一,但并不能就此证明幼童的“中文有根底”。留美幼童出国前不仅汉文基础浅薄,而且世界观并未形成,也不能推导出他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的价值观,这是由幼童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据第二批留美幼童丁崇吉后人回忆,丁崇吉晚年“还喜欢到为族人小孩办的私塾去看看,除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外,还恭恭敬敬地坐在后排,同孩子们一起认真地听老师讲解。他常讲,自己从小就出国读洋文,中文底子太差,更要从头学起。”^[14]再以同时代同龄者为例:容闳自7岁开始进澳门的传教士的西塾上学,其汉文基础微不足道,“至予之汉文,乃于1846年游美之前所习者,为时不过四年。以习汉文,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15]归国后容闳用了数月时间重温汉语。

幼童的中学根底还受到清代的初级教育状况的制约。清代启蒙教育在乡村和都市之间的差异不大,幼学启蒙读物以三本书为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这三本书,以不重复的汉字编成韵文,这种文言文的对仗韵文,旨在教授幼年学生识得汉字。更高一级的教材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再从教学方式而论,对于乡村贫家子弟来说,不同年龄的幼童聚于一室的私塾,学习的效果差强人意。顾维钧3岁进私塾,学生一共25名,先生是科举屡试不中的穷秀才,“学生年龄不等,小的像我才三岁多,大的十五、六岁。水平也自然不同,程度高的读五经,低的刚认字。”^[16]马叙伦回忆私塾:“十多人挤在一间小屋,不断高声朗诵,死记硬背不知所云课文。”^[17]这些教材中固然排列了中国历史的和道德的内容,对于儿童的理解力而言,很难说便有了“中学”的根底。

再谈世界观,且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4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20岁时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写于1899年的游记《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的序言中,他说:“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县,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大风潮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18]李欧梵认为梁启超成为世界人的过程,是因为戊戌政变流亡日本,目睹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又要从亚洲的第一先进国到美国去,在这个过程中写下了《汗漫录》^[19]。我们可以假设,即便幼童有梁启超的禀赋和经历,也须得成长至弱冠之年才可谈及世界观。所以石竟文中所言幼童的“信念”和“信仰”所来何处值得商榷。

幼童留美,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洋务派强国之道中的应急求才之策,对于容闳是彻底改造旧中国的理想和事业,对于身当其冲的幼童,“中学”仅是启蒙阶段,世界观尚未形成,根基未牢,遑论“代表国家”的“信念”和“憧憬”导致幼童被强行中断在美学业遣返回国的危机根源已经形成。

二、在美国发生的“文化冲突”导致计划的夭折

洋务派的压力既来自保守势力的攻击,也来自事属首创,经费投入甚巨而结果难料,曾国藩的奏折所言可以一窥洋务派不安的心态:

“此则入选之初,慎之又慎。……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才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20]他为此事的结果定下一个折衷的调子,能收“拔十得五”之效。为了保证这个“拔十得五”,代政府出使西洋管束幼童的委员人选至为重要。李鸿章要求这个出使外洋人材固然以“通知西洋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但又“必须博学多识知大体”。原本起事时的容闳通晓洋情应当是不二人选,可是容闳在清政府官员看来有一缺陷,便是“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21],后来的发展证明,事情恰恰就出在这个“大体”上。显然陈兰彬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更加信任的人,然而“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丞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22],故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格局形成,矛盾亦随此埋下伏笔。

丁日昌向容闳介绍这个不啻突然冒出来的翰林陈兰彬时,将此描述成一个富有深意的策略性的安排。丁对容闳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量,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有杀阻力也。”容闳的事业一朝有望,喜不自胜,此时他并未虑及其它。“予闻丁抚此议,极佩其思虑周密”^[23]。后来他当知此番思虑周密,成了他毕生事业的障碍,恰恰因为与这个旧学派的人共事,而功败垂成。

幼童到达美国以后,不是从读书开始,而是从进入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开始的。先期到达美国的容闳采纳了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 1811-1892)的建议,将语言尚不过关,不能直接进入美国学校学习的幼童,两三个一组分散到美国家庭中去。在学习语言的同时,美国文化甚至先于语言开始影响中国幼童。从生活习惯、日常礼仪、乃至着装和装束,都对这些在中国本未涉世的孩童内心产生冲击。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

史》中记录了留美幼童的回忆。在美国家庭直接受到异质文化的熏染,加以幼童先天文化根底不足的缺陷,迅速催化幼童的“西化”。“当时幼童平均不及15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American Idea & Ideals)”^[24]。

变化就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穿长袍结辫子无疑在美国社会里就外貌而言便形同异类,性别特征不清,美国人看“颇似女孩”,到了学校里,据高宗鲁书中记载:“美国同学均哄笑叫他们中国女孩!这种嘲笑,引来不少次打得鼻青眼肿和纠纷”^[25]。没有多久他们就穿法兰绒西装上班,将辫子盘起来,后来发展到有几位幼童终于剪了辫子。穿长袍结辫子是清廷的规定,本来已经存在于容闳和陈兰彬之间的矛盾,从此开始浮出水面。在陈兰彬看来,辫子是忠君爱国,长袍象征中国士大夫,这些外观的改变反映了幼童思想观念的改变,置国君与国体而不顾,事非可恕。而容闳不以为然,“学生居于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小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间为调停人。”^[26]容闳不仅调停,还代学生辩护。言语中是喜欢这种性灵上的变化的:“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正当矣。”^[27]

幼童出洋之前,清廷已虑及年龄幼稚而怕幼童荒疏“中学”,出洋肄业局也的确派了中文教习随幼童至美。1874年,李鸿章应留学事务所的请求,同意在哈特福德建造一座大楼以供留学事务所永久办公之用。1875年,容闳等就迁入这座三层楼中办公,感觉“极其宏敞”,大到可容教员和学生75人同居一处。容闳提到屋中有一大课堂,专备教授汉文之用。1878年4月,哈特福德的吐依曲尔牧师在耶鲁法学院演讲时介绍中国留学事务所,“其中有官员办公处,也寄住了学习汉文的班级。学童们为此分成约20个班,每班每次在大厦中小住两周,轮番更替。”^[28]石霓认为,直到1878年,幼童仍按清政府的定制学习汉文,她以相当篇幅论证了幼童没有抛荒“中学”,容闳也没

有纵恣学生荒废“中学”^[29]。

事实上,“中学”的问题,不在幼童是不是按制而习,也不在容闳是不是重视,在于美国环境对幼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主观臆想,要在留美幼童中保持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企图已是徒劳。

按定制学习汉文并不能扼制幼童迅速“西化”。幼童于西学和中学之间明显倾向于西化,这是不争的事实。第一批幼童容尚谦回忆:“当时每值暑假,学生均来到哈特福德的出洋局学习中文。因为中文教习处罚十分严厉,故幼童谑称出洋局——这一华丽楼房为地狱之屋”^[30]。由此可见幼童对习“中学”的态度。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另一个事实,容闳对幼童的荒疏中学的确不以为异。汉文教习容增祥向李鸿章状告容闳“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31]高宗鲁对幼童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完全熟悉了美国生活方式,而于中文课业的放弃,作了客观地分析,他说:“中国幼童对美国一切的全面接受,使他们对中文课业的学习,益增困难。”“幼童对中文所知甚少,也无心学习,即使有心学习,但美国环境压力之大,实难抗拒,留学经年,言行思想自均似美国学生。”“容闳赞成完全与中国习俗隔断,幼童对中文课业的荒疏,他不以为异,未思纠正。容闳的此种态度,使幼童出洋肄业局遭到中国保守‘反对派’最严厉的指责与攻讦。最后,该局的撤消,幼童们学业未成而召回,此点实为重要原因之一。”^[32]荒疏中学,被保守势力认为是幼童种种离经叛道表现的根源之一。

被强行召回的另一个原因是剪辫入教。1880年,第二批幼童容揆写信给父亲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已经信奉了外国的宗教。其父写信给留学事务管理局,请求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遣送回国。信教的还有第一批幼童谭耀勋。这两人在1881年遣送回国途中逃逸。容揆脱离留学事务局的控制,得到了其叔父容闳的资助(容闳通过吐依曲尔牧师转交给容揆一笔留美的学习费用)。这些当然成为留学事务局“容闳纵恣学生荒废中学,剪辫入教”的口舌。

1879年留学监督吴嘉善“接任之后,即招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跪拜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33]陈兰彬、吴嘉善奏称裁撤的理由是:“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34]

1881年,史无前例的大清官派留学计划以撤回全体留美幼童而告中止。

清政府只希望幼童学得取出煤铁五金之矿的“洋法”,不曾想同时竟然也沾染了西洋的“流弊”与“恶习”,大大动摇了清统治者的世界观。在19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建立在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基础上的。在地理位置上,开始中国人就相信地球是平的,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而皇帝是天朝之子,是世界的中心。1793年乾隆皇帝在答复乔治三世的使节马戛尔尼时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天朝抚育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35]在欧洲即将发生工业革命前夕,乾隆皇帝的这番话最能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全部认识。几十年以后,英国的炮舰开始轰击骄傲的只等万邦来朝的天朝帝国。真正走出去一帮天朝的幼小臣民,却舍弃了中国的几千年传统,俯仰于化外之国,使本已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

对于这种迅速美国化的结果,似乎西方学者早有预见:“中国幼童们,除却书本老师传授的知识,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这是可以意料中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以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而无动于衷,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36]罗兹曼评述留美幼童时道出了清政府中一些急于强国的官员此举必然受挫的原因,在于其世界观念的影响。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幼童除了在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时是一个活动的受体以外,在其它行为上,并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承载的文化传统的虚弱,加上明显的政府官派背景,出国与突然招至撤回国内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容揆是留在了美国,由于容闳的帮助而得以成功。恰恰是彻底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而选取了美国的价值观。

注释

[1]李鸿章:《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驻洋幼童勺拨经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0,第4页。

[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

[3]《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惇亲王奕訢等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4页。

[4][5][6][8][15][23][26][27][28]分别引自容闳:《西学

东渐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第149页,第89页,第53页,第94页,第152页,第162页,第162页,第184页。

[7][25][32]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第37页,第26页。

[9]李鸿章:《同治十年四月初一日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一,第4页。

[10]《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8页。

[11]《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4页。

[12][20]《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

[13]詹氏家藏家谱抄本原文,引自徐启恒、李希泌著《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14]丁志华:《第一个担任海关副税务司的中国人——忆父亲——留美幼童丁崇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第3期(2005年5月)。

[16]《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17]马叙伦语,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18]梁启超:《汗漫录》,《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

[19]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载《跨文化对话》第3期,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58页。

[21]李鸿章:《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卷二十二。

[22]李鸿章:《祭议三事》,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第18页。

[24]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

[29]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

[30]容尚谦:Yung Shang Him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T'ien Hsia Monthly, Vol. IX, No. 3 (Oct, 1939).

[31]《李文忠公全书》卷十九,第21页,朋僚函稿,《复陈荔秋星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77页。

[33]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34]《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64页。

[35]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36]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China in the U. S.”,引自台北《传记文学》第43卷第6期。

责任编辑:肖波